

政经逻辑:内涵、困扰及方法论应对

雷艳红^a, 王宝恒^b

(厦门大学 a. 公共事务学院; b. 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政经逻辑”指的是“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和“被权力操纵的经济”。政经逻辑在揭示政治经济如何相关的同时,还导致政治信任度降低后的立场分歧以及研究独立性受损后的研究与实践关系争议。对此,应从方法论层面强调政经学科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同时研究者尽力做到研究方法的自觉、自明与他明。这有助于降低人们对政经整合研究科学性的质疑,进而拓展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 政经逻辑; 新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2)02-0001-08

《资本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后一百多年,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有了长足发展。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对政治经济相关性的理解无外乎“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本质联系”、“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等等。不过,“知道相关”并不等于“知道如何相关”,这也因此规范了政经整合研究者的任务,即向人们展示政治和经济是如何相关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政治经济学^①所做的大抵上未超出这一范畴。此前,国内学者或从研究特点,^[1]或从研究范式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内部流派作了区分。^[2]但是,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经济相关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国内学界往往语焉不详,西方学界则更多是不言自明。本文通过对新政治经济学代表性成果的解读,以“政经逻辑”指代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成果并界定其内涵,而后阐述“政经逻辑”引发的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困扰,最后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如何降低这些困扰。在此过程中,本文试图间接回答另两个问题,第一,为何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和维护经济学的独立;第二,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维护经济学的独立。

一、政经逻辑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较好地弥合了19世纪后期以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

收稿日期: 2012-0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财政公共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1BZZ048)

作者简介: 雷艳红,女,江西九江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历史学博士;王宝恒,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中的“新政治经济学”指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核心是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兴起的新兴交叉学科,它有别于西方另一同名学术流派。虽然都称为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以研究方法来确定,后者则因研究对象而形成。此观点受教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朱天彪老师,特指出并致诚挚谢意!

后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学科细分化后的各自为政、自我封闭。毋庸置疑,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政治经济的相关性,研究目标在于揭示此相关性。然则政治经济相关性究竟指的是什么,新政治经济学因专注于具体发现而未及提炼概括,相关解读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也是一带而过,未及深究。本文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政治经济学重要研究成果的分析,拟以“政经逻辑”一词概括之,具体而言,指的是“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和“被权力操纵的经济”。

关于“被利益绑架的政治”,当经济学将注意力从市场扩大到政府时,其核心目标是探究政治中的人是如何行为的。在此过程中,利益或效用成为研究的观察视角,即将利益最大化作为众人行动的目标,据以解读政治行为、公共决策以及政治格局。这也因此规范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理解和解释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促成这一转变的理论背景是,认为政府和政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为各自的利益而选择政策。^①由此不难理解,新政治经济学习惯由“经济人”假设推导出政府官员和官僚组织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以及利益集团对市场力量的操纵、对价格机制的扭曲,等等。例如,尼斯坎南(Jr. William A. Niskanen)指出官僚都是争取预算最大化的个体,^[3]塔洛克(Gordon Tullock)、克鲁格(Ann Krueger)揭示了政府官员与工商业者互动过程中的寻租行为,^[4]奥尔森(Mancur Olson)专注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逻辑,^[5]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从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内的政治联盟的,^[6]而贝茨(Robert Bates)、列维(Margaret Levi)则致力于研究制度约束下国家官员行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7]

如果说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强势谈判者的利益,在民主社会中,普通人的个人利益算计同样影响着政治的制度变迁。唐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探讨了民主体制中的投票行为和党派竞争,通过强调政治行动中行为人的不同算计来还原或解释政治运作与制度的形成、演变,展示了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8]D. Roderick Kiewiet通过分析经济问题对选民的重要性,揭示了个体的投票行为与经济环境的关系。^[9]作者向政治家明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能让经济增长,那么,不考虑你所选择的特殊政策,你也能再次当选。佩尔森和塔贝里尼(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则专注于探究理性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是如何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的经济后果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政策偏好进而被整合进公共政策的。^[10]考虑到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德雷泽(Allan Drazen)主张将利益冲突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组织原则,理由是,只有当人们对即将颁布的经济政策或分摊的经济成本与利益产生分歧时,政治行动才会发生。^[11]

“被权力操纵的经济”中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和文化思想层面的权力。谈到政治权力,不能不提及选举政治对经济实践的影响。在政治的商业周期理论中,研究者们通过解释政府的声望和投票行为是如何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旨在阐明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与民主选举的政府有关。^[12]在诺德豪斯(W. D. Nordhaus)的假设中,执政党为了保证连任,将利用适应性预期的滞后,在临近选举时使有利于自己的选票预期比例最大化。于是,政府会在任期之初有意识压低产出,在选举关头则炮制繁荣以欺骗选民。^[13]

至于商业权力对经济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K. Marx)已经探讨了资本家是如何制造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周期主要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势力,而不是政府的行动。^[14]这是其与现代的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区别,或许19世纪的政府操控经济的能力不如20世纪的政府。至20世纪中叶,卡列茨基(M. Kalecki)进一步指出,工商业领导者们的阶级本能告

^① Roland Hodler 谈到,“主流经济学普遍将政府设定为最大化社会福利而决策,或是认为政策不过是产生于决策框架,而政治的经济学则认为政府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而选择政策。”具体而言,“政治的经济学遵循的是理性行动者范式,认为投票人、政治家、官僚和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和独裁统治者都是理性行动者,旨在最大化他们各自的效用,而不是社会福利或其他。”参见 Roland Hodler,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1(3), 2008, p330 - 335.

诉他们,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牢靠的,而失业才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15]其后,博迪和克罗蒂(R. Boddy and J. Crotty)通过分析二战后的阶级冲突与宏观经济政策,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为资本家服务和工会构成的对这一服务的限制共同产生了政治的商业周期。^[16]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确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因果关系的证据。

文化权力是如何影响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的?20世纪中期,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便尖锐地批评经济学家炮制的消费欲望(消费者主权学说)扩大了社会的不平衡,而这一欲望的产生源头则来自于厂商的逐利动机,旨在通过发现市场创造一个又一个的需求。在加氏看来,消费者主权是一种神话,为了维持一个从生产到收入不断增长的丰裕社会,必须制造出新的欲望,而广告宣传的作用即在于创造和操纵新的消费者物品欲望。^[17]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也谈到,“一旦经济学开出的秘方获得政治上的尊崇,一旦政党向政策实体负责,而后者依靠的是关于‘何为真正的经济问题’的独特见解,便会出现对这些经济观点的大量政治投资以及为捍卫这些观点而动用强大的修辞资源。”^[18]如此看来,经济学、商业广告和政治文宣构筑的文化权力其实与商业权力甚至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彼此结盟。

二、政经逻辑的困扰

本文中的“政经逻辑”不仅用于指代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成果,既然是探求政经互动,那么互动的不只是客观的政治与经济本身,互动还可能发生在政经互动研究之间、政经互动的实践之间以及政经互动的研究与实践之间,而这些互动所引发的困扰恰恰是新政治经济学者应当高度警觉的。

困扰一:政治信任度降低后的立场分歧。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通常是为了揭示政治的私利性,如展示政治运作特别是经济政策制定背后的利益纠葛甚至阴谋。正是通过展现政治的“唯利是图”和官员的自利,经济学成功地拓展了研究领地,经济学范式获得了本领域之外的解释力,其作为分析工具的市场占有率大大提高了。目前尚难判断这种影响对于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而言是利还是弊,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政经逻辑”关于政治被利益绑架的研究发现或理论阐述,大大削弱了人们对民主政治公共性的信心。

尽管新政治经济学建立了民主制下政治声望和经济业绩之间的联系,其实也就是经济业绩对政府政治声望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不同的政府所强调的经济问题是不同的,而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思想意识的不同,部分是因为政府利用现有经济条件的动机的不同,而这两种原因都可以改变民主制下选民的关注点。这是否意味着,不是简单地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隐性的政治决定了公开的政治,政治是别有用心的,民主选举的政府也不例外。于是,与民主政治的传统理解不同的是,现代视野中的民主政治与政府并不必然具有公共性。理应是官员秉公持正的公共领域,常常是由选举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官员的私利支配。政府是关心自己寿命的政治动物,而不是致力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权力代表,至于政府颁行的政策很可能是反映或者更符合社会特权阶层的利益。

如此一来,新政治经济学虽然发现了“政治被利益绑架”,但其规范和指导政治经济实践的作用和功能并未因此清晰,反而加剧了政治主张的分歧,这便是政经逻辑的第一个困扰。表现为:一方面,既然私利常常干扰公权,那么公权的行使者以及公权本身就应当受到约束、限制和监督,应当通过一系列可为的机制降低“经济人”逻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虽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心的是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的,但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样,他们更关心的是政府干预经济妨碍了自由。在

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自由市场与开放竞争是降低政府负面性的最好途径。为此,政府的权力应当受限,政府管制最好是解除,以给予经济发展以充分的自由。

另一方面,鉴于利益集团在经济政策(政治领域)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人们也有理由认为,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不一定是自由的,更可能是特权阶层以自由的面具上演的独裁。于是,与之前强调对政府的约束限制相反,市场自身也应受约束和限制。^①至于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经济自由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增长,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②具体而言,政府应该适度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以政府行动削弱自由选择中的制约^③;通过政府调控如财政政策、福利政策来优化利益分配,缓解自由市场经济的后果如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紧张。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无所不在的私利对公共政策的侵蚀及控制,政府更应该独立行事,摆脱全球化、自由市场秩序的影响。毕竟,只有政府才能与破坏稳定的市场力量相抗衡。

困扰二:研究独立性受损后的研究与实践关系争议。

尽管20世纪以来选举政治的发展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另一后果却是,由于选举政治的力量,经济学也有些“选举化”了,或是政治化了。根据政治的商业周期理论发现,政府总是试图在选举之前以通货膨胀式经济繁荣导致的就业与收入增加去赢得选民的支持,而对通货膨胀所需付出的代价则在选举之后支付,为此,政府将采取控制价格之类的紧缩措施,而这又会导致就业和收入的下降。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周期循环,在政治选举中不断地重复。由是观之,经济理论或论点大行其道的前提是获得政治上的认同,理论好不好用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如布伦南所云,“政治家并不是经济学讲师,他们只是利用了流行的信仰。……一旦政治家将自己置于这些流行的主张中,……这些主张就不再只是孰对孰错的学术论争,而是成为政治争论。”^[19]权力对经济学的影响无处不在,2003年初在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中国经济是热是冷时,曾有学者指出,经济是冷是热虽然是学者之间的争论,但最后的问题是利益问题,实质是权力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看谁的谈判能力强。^[20]

如此一来,这是否意味着,“被权力操纵的经济”一不留神就成了“被权力操纵的经济学”?表面上,是经济学在影响政治,实际却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在“规范”和“利用”经济学,经济学沦为权力的掌中物。显然,如果研究者受制于权力的影响而不自觉,或研究者故意放弃中立,则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便是奢谈。于是,政经逻辑的另一困扰随之而来,即在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处理上,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是,经济研究与政治实践原本就难拆开,难以分清你我。既然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中的重大问题”,^[21]则此理解应该建立在对该国的制度结构、文化心理以及政府官员本身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这不仅是因为,了解一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助于经济学家为政府提供更合理可行的经济政策建议,更在于,公共政策并不是由天使制定的,不少政策只是有利于权势者,有时政策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这些表明,若不深入

^① 加尔布雷斯在《掠夺型政府》一书中曾指出,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更难控制,故应受约束(参见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掠夺型政府》,苏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更激进的看法是,政府之所以受到各种利益的干扰、甚至绑架,很有可能不是因为政府权力太大,而是因为权力太小,小到可以受各种利益的干扰。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国家主义理论流派为代表,如 Peter B. Evan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tul Kohli, “State,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③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不会考虑,在市场机制中是否存在一些限制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因素。

政治之中,便很难弄清楚经典理论原理在现实中的偏差和如何被扭曲。^①因此,布劳格(Mark Blaug)指出,“经济学家一直同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PAP)。”^[22]

另一观点则是,明确经济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区别。既然权力在现实的经济运行、经济政策制订乃至经济现象解读中利用经济理论进行操纵,则研究应保持与现实的距离,这有助于降低政治的干扰和提高研究的公正。Alt与Chrystal在指出政府的声望(或选举表现)是由主要的经济指标如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等决定的同时,^[23]却又提醒我们,看似客观的指标,很有可能掺杂了权力因素而变得不那么客观了。如果这是事实,且具有代表性,则无疑给学者们提了一个醒,理解经济问题的本质、找出症结比开出治病药方更重要,否则药方的危害性很可能大于疾病本身。

三、应对困扰: 从学科定位到研究方法

尽管政经逻辑的困扰更多是隐性的,难以准确度量,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则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和公正难以保证。如何解决?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应在明确政治学 and 经济学学科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并实现研究方法的自觉、自明与他明。

关于学科边界的恪守与更高层次的融合,考虑到经济对政治或政治对经济的跨界行为特别是前者已经很普遍且不可抑制,新政治经济学务必明白,跨学科研究首先是要克制自我而不是通过取代对方学科解释来限制对方。这意味着,政治学和经济学首先要恪守各自的学科界限。^②对政治学而言,尽管“不满意现存的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阐述,希望重新思考国家、市场等概念”,^[24]也应该回到自己的立足点,如推动政治体系的改善和改革,让政府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而不是树立一些空泛的、无法衡量的目标;不必为具有强大蛊惑力的自由市场所迷惑,应该看到现实世界(特别是自由市场)的残酷性;自然,政治学不必盲信经济学,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奴仆,以财富增长为唯一目的。

如果说在学科边界的恪守中政治学要自信,对经济学而言则是要自律。经济学的学科殖民在壮大自身的同时,也会被侵蚀。相反,政治学的自信更有助于经济学的独立。长期以来,与政治学者相比,经济学家与政府部门的接触更频繁、关系更密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往往会出任政府部门的政策顾问或是议会的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影响甚至直接参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对此,经济学不必过于沾沾自喜,缺失了政治学的冷静观察,卷入政治之网的经济学更加难以自拔。卡岑斯坦(P. J. Katzenstein)在谈到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和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时,曾指出:“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笔者注:经济学与政治学)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那么,什么是“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卡岑斯坦高度认同“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

^① 例如,在佩尔森看来,既然基本的经济模型是完全对称的,那么不对称的分配就需要政治程序中的某种非对称(去实践)(参见Torsten Persson,“Economic Policy and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The Economic Journal*, 108, 1998, p310-327)。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是政治制度形成了经济政策,而不是所谓的经济理论。

^② 这对于反对政治学与经济学相隔绝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可能很难做到。如J. A. Caporaso和D. P. Levin所云,新政治经济学“反对把政治学与经济学隔绝,强调政治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行为”,“正是在适用同一种行为原则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具有因果联系上,政治学与经济学统一了。”(参见J. A. Caporaso and D. P. Levine,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21.)

释力”^[25]从学科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政治学与经济学更高层次的融合。基本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应该将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嵌入到特定政治文化背景和政治思想构造中,这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避免简单的“自利”推断,还能深入观察经济理论的构造。与此同时,研究者还需要对国家政策或行政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具备深刻的政治与哲学眼光。

面对政经逻辑的困扰,除了学科定位的调整,研究者还应致力于研究方法的自觉、自明与他明。虽然新政治经济学者声称他们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中的公共机构,^[26]但经济学方法并不必然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如果说19世纪的政经整合挑起了方法论的争议,20世纪的政经整合更像是方法论的炒作。也因如此,研究者务必扪心自问,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究竟是现实社会的真实现象,还是研究者幻想出来的虚妄之象?研究的发现是受信仰的驱动和规范,还是服从于科学研究的严格程序?例如,无论是加快经济一体化,还是放慢经济一体化;是推进,还是反对全球化,如果证据都是精心挑选的有利于自己的论点的,则论证即便再严谨,也不表明研究反映现实和接近真实,而更可能是歪曲扭曲。在《给分裂的政府一个机会》一文中,尼斯坎南认为,当反对党至少控制一个议会(参议院或众议院)时,联邦政府会得到改善。其理由是,艾森豪威尔和克林顿执政期间反对党控制国会,而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战争如一战和二战、越南战争是由民主党总统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由共和党总统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下发动的。^[27]这一“研究发现”在政治学看来,未免过于简单武断。由此可见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性,特别是跨学科研究中借用另一学科的逻辑(概念、方法、理论、工具等)解释本学科领域的问题,或是运用本学科的逻辑解释另一学科领域的问题时,因为这涉及本学科方法在另一领域的适用性问题。

至于研究方法的自明与他明,本文将此论题的阐述建立在明确学术研究“是主观,还是客观”、“是自利,还是公利”的基础上。首先,学术研究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是主观的。理由是:(1)“主观”是研究动力,体现了研究的创造性。研究者在着手所谓科学研究之初,就注定了偏见,因为他必定是带着先天的倾向和后天的观念去理解研究对象,例如,有关概念内涵的辨析往往是立足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立场。这也注定了研究成果在未来将是被纠正的,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所论,科学是可证伪的,而不是可证实的。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知识和理论都是可纠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偶然性,而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态度。如此一来,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证明研究成果的真理性,而是以丰富我们的认知和知识体系来纠正我们的偏见。(2)“主观”标志研究的推进。正所谓时过境迁,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会因为认知领域或现实社会的重大革命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观念转变或概念转变,例如,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面对研究的主观属性,研究者能做些什么?能否从方法论角度尽可能降低主观性。本文提出,研究者可以自明甚至揭示自己的主观性。譬如,对待正在或将要研究的事物,研究者应反思自己可能的偏见,评估这一偏见可能造成的研究路径偏差。对于已经做出的研究成果,应思考是否因为个人的偏好干扰了研究发现,或是勇敢地展示个人的偏好是如何影响了论据的选择、论证的组织到论点的形成的。

其次,学术研究是自利,还是公利。政经逻辑的揭示特别是政治被利益绑架的发现虽然让人们重新审视国家的作用,但不是为了强调国家的作用,而是通过指出政治的自利彰显自由竞争的市场的价值。这一研究发现非常给力地支持了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念,似乎政治可以用经济来解决。然则,我们还需承认一个事实:学术研究除了被权力有意无意地操纵,研究者本人还自觉不自觉地或服从于个人信仰的感召,或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安排,或服从于个人利益的选择。这无可厚非,因为学者对研究的利益期待常常高于对研究自身的兴趣,很多时候是利益驱策而非兴趣使然维持着研究者的热情。至此,利益本身已无可厚非,需要区别的是,学术研究究竟是私利主导的,还是公利主导的。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利动因与公利结果(公利的实现是研究

的副产品),另一种为公利驱动与私利结果(私利的满足为研究的副产品)。两种自利,前者是刻意的,后者是无意的,不过对局中人和局外人,却不一定是清楚的,而很可能稀里糊涂,难以自我辨明和为他人所辨。正因如此,更应强调研究方法的自明与他明。自明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者的自我检视,降低主观和自利的干扰;他明的作用在于尽可能地如实展现研究过程,方便后来者明辨研究。

四、结语

“政经逻辑”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概括,它的主观或客观存在都带来了现实的困扰。“被利益绑架的政治”降低了公众的政治信任度,加剧了政治立场的分歧(一方不断地强调市场的合法性、高扬市场的经济作用;另一方则强调国家的必要性,主张国家的经济功能)。“被权力操纵的经济”则使得经济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处理更加复杂、莫衷一是。尽管这些困扰更多表现为隐性的,且难以主动认知,却提醒人们思考“为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维护经济学的独立”。为了避免研究者落入价值取向的利益窠臼和降低理论分析的权力干扰,本文提出学科层面的学科边界恪守与更高层次的融合以及研究方法层面的自觉、自明与他明,这不仅是作为“政经逻辑”困扰的方法论应对,也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维护经济学的独立”。透过新政治经济学的政经互动研究发现,人们愈加确信,政府和市场都应受到监督,而本文关于“政经逻辑”及其引发困扰的阐述,则提醒人们,学术研究也应受到监督。

注释:

- [1] 王小文《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永桃、范春辉《经济政治学: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陈潭《经济政治学论纲:理解政治的公共选择理论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葛笑如《政治—经济互动研究——兼论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理论界》2007年第1期。
- [2] 雷艳红《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 [3] [26] William A. Niskane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Atherton, Inc, 1971. preface.
- [4] 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No. 5, 1971; Gordon Tullock. *Public Goods, Redistribution and Rent Seekin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cations, 2005; Ann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3, 1974.
- [5]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6]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7] 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Robert Bates.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8] Anthony T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 [9] D. Roderick Kiewiet. *Macroeconomics and Micropolitics: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10] T. 佩尔森、G. 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 [11] 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杜两省、史永东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2] T. Amemiya. "Qualitative Response Models: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19(4) , 1981 , Dec. , p1483 - 1536; Douglas A. Hibbs. "Economic outcomes and political support for British governments among occupational class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76(2) , 1982 , p259 - 279; Douglas A. Hibb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Macroeconomics and Elector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V. K. Borooah and F. van der Ploeg.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13] W. D. Nordhaus.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42 , Apr. , 1975 , p169 - 190.
- [14] K. Mark.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 1867.
- [15] M. Kalecki.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Political Quarterly* , 14 , Oct. /Dec. , 1978 , p322 - 331.
- [16] R. Boddy and J. Crotty.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 - 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7(1) , Spring , 1975 , p1 - 19.
- [17] James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58.
- [18][19] G. Brennan. 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asman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Occasional Paper No1 , Oct. , 1996 , http://www.utas.edu.au/ecofin/Library/occasional_papers/OP1.pdf
- [20] 刘伟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经济的增长问题》,《北京大学博士生讲座讲义》2003年10月30日。
- [21] Timothy Besley.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British Academy - Keynes Lectures in Economics , 2004 , p131 , p371 - 395.
- [22] Mark Blaug.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23] James E. Alt and Alec Chrystal K. *Political Economics*. Berkeley ,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3.
- [24] Andrew Gambl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 , Vol. 43 , No. 3 , 1995.
- [25] 彼得·J. 卡岑斯坦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朱天飏主编 《比较政治经济学系·前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
- [27] William A. Niskanen. "Give Divided Government a Chance" *Washington Monthly* , Oct. , Vol. 38 , Issue 10 , 2006.

[责任编辑:陈双燕]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 Its Connotation , Perplex and Methodological Resolution

LEI Yan-hong^a , WANG Bao-heng^b

(a.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b. School of Management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Fujia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political-economic logic refers to politics captured by interests and economy manipulated by power , which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economic man. While disclosing how politics relate with economy , p-e logic leads to the position divergence due to reduction of political trusts and the relationship dispute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with the damage of research independence. For this reason , in methodology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sciplines should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integration with mutual respect ,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ers should apply research method consciously , self-evidently and try to make it evident to others. With that , it would help to remove people's doubt about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e research , and then expand the academic space of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 ,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 methodology